

《水浒》简评

北京人民出版社

1201.6/46

I201.6/46

《水浒》简评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组

《〈水浒〉简评》编写小组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29966



北京人民出版社

629966

《水浒》简评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水浒〉简评》编写小组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印张 46,000字

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71·144 定价：0.20元

目 录

一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3)
	(一)《水浒》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 路线	(3)
	(二)《水浒》美化和颂扬投降派头子、反革命两 面派宋江	(19)
	(三)《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是孔 孟之道	(31)
二	《水浒》的人物与梁山泊两条路线斗争	(43)
三	《水浒》的故事演变、作者、版本和它的 社会影响	(62)
	(一)《水浒》故事的演变过程	(62)
	(二)《水浒》的作者和版本	(68)
	(三)《水浒》的社会影响	(74)
四	关于对《水浒》的评论问题	(78)
编 后		(92)

毛主席指示我们：“《**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水浒**》一书的关键在于宣扬投降主义，揭露了宋江作为一个投降主义路线头子的真面目。宋江这个地主阶级分子，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出发，在梁山起义军内部大搞修正主义投降活动，终于葬送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水浒**》一书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竭力进行美化和歌颂，这就使它成了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

关于《**水浒**》一书的性质，鲁迅在四十多年前就曾作了精辟的论述。他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但是，解放以来的许

多评论《水浒》的文章，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发表了不少错误的观点，为《水浒》的投降主义作辩护，唱赞歌。

对《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采取什么态度？是歌颂还是批判？这不是简单的对一部书的评价问题。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指出，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因此，为了反修防修，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我们应当对《水浒》这部反面教材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和批判，从中吸取反面的教训。

一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 主义的反面教材

（一）《水浒》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的投降主义路线

《水浒》是一部写成于元末明初的长篇小说，它以封建时代农民起义为题材，比较详细地描写了北宋末年以梁山泊为根据地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作者施耐庵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写农民起义的，小说突出表现的是农民起义军向地主阶级投降，它集中宣扬的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概括起来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向朝廷投降。

《水浒》全书的情节故事，几乎都是围绕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中心来安排的。《水浒》里写了许多反贪官的故事。一些“贪官”、“奸臣”，被写成为主要的反面人物，如高俅、蔡京、童贯、杨戩等“四个贼臣”，以及他们的帮凶，即高唐州的高廉、江州的蔡九知府、

青州的慕容知府、大名的梁中书和华州的贺太守等等。通过这些故事，作者指斥了高俅等“为官贪滥，非理害民”。但是，作者却没有进一步去反皇帝。相反地倒是去美化皇帝，为皇帝辩护。作者让宋徽宗责骂高俅、童贯等贪官说：“都是汝等嫉贤妒能之臣壅蔽，不使下情上达”；“汝这不才奸佞之臣，政不奏闻寡人，以致坏了国家大事”。这就是说，作者认为，封建社会存在的一切严重问题，是几个贪官造成的；“圣主为治本无差”，皇帝概无责任。

《水浒》所鼓吹的这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路线，具有明显的反动性。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最大的剥削者，是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总代表，是社会上一切反动黑暗势力的总根子。所谓贪官，不过是皇帝的爪牙和帮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是只碰枝叶不动根本，这是地主阶级完全可以接受的东西。而且，在“只反贪官”中，反的和被反的，双方都以不反皇帝为前提，双方都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目的都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制度，他们间的分歧，充其量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统治策略和统治手段的不同，甚至还只是个人、派系和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毛主席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是对“只反贪官”斗

争性质的深刻概括。宋江、高俅之间被《水浒》作者大肆渲染为“奸贼阴谋害善良”的这场斗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宋江受招安前，它是地主阶级在朝派同山野派的斗争，又是在消灭农民起义的策略上的剿派同抚派的斗争；在受招安后，则又演变为一场两个集团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在皇帝面前的争宠斗争。宋江在梁山上曾说过：“高俅那厮是个心地匾狭之徒”，“闭塞贤路”。这是对宋江、高俅前期斗争原因的很好说明。宋江要投降，高俅却多方阻挠他投降，而且还要用武力消灭他，高俅“闭塞”了宋江投降做官的“贤路”。高俅在第一百回曾说过：“这宋江……今日倒吃他做了有功大臣，受朝廷这等钦恩赏赐，却教他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惹人耻笑？”这又是对宋江、高俅后期斗争原因的很好说明。宋江挤进朝廷，威胁了高俅一伙的既得权益。所以，宋江和高俅之间的这场斗争，就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就是大狗与小狗、饿狗与饱狗之争。

《水浒》把这种狗咬狗的“只反贪官”斗争当作主要矛盾来写，这就完全混淆了封建社会矛盾的性质。毛主席说：“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

阶级的矛盾。”④把“只反贪官”突出出来加以鼓吹，这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掩盖农民和地主两大阶级的矛盾，转移农民革命斗争锋芒而经常使用的一种欺骗手法。在封建社会矛盾极度激化、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往往抛出“奸臣误国”论来，把他们当中几个臭名昭著的人推出去，冠以“贪官”、“奸臣”的名号，让大家来反，以此作为挡箭牌，妄图平息人民斗争的浪潮，保护统治集团的其他部分，特别是保护皇帝利益不受损害。因此，“不反皇帝”，为皇帝开脱罪责，固然是直接为统治阶级效劳；“只反贪官”，把一切问题归咎于贪官，同样也是一种巩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手段。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一条全面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路线，它同农民革命的利益格格不入。农民革命绝不能接受这条路线；接受这条路线，就必然要使农民革命本身变质、转向，就必然要走向投降。

梁山起义军的失败就是由于其中的许多上层人物接受了这条路线。他们的领袖不好。宋江是这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路线的忠实信奉者和推行者。他有一个根本的观点：“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蔽塞，暂时

④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八八页。

昏昧”。所以他的目标只是反贪官，对赵宋皇帝至诚拥戴。宋江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出发，在梁山上大搞修正主义，推行一条投降路线。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最后得逞，遂使梁山农民起义军遭到了毁灭的命运。

宋江在梁山上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路线，其活动是多方面的，是无孔不入的。他的活动很有典型意义，很值得革命人民研究一番，“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宋江的活动首先就是以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窃取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进而修正农民革命的根本路线。

在宋江上山前，梁山起义军在晁盖的领导下，奉行一条“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矛头指向整个封建统治集团，特别是指向最高统治者赵宋皇帝的正确路线，革命事业得到蓬勃发展。晁盖从来没有要到朝廷里去捞个一官半职的念头。他们是既反贪官，又反皇帝。宋江上山的目的与晁盖完全不同，造反，在他看来是“灭九族的勾当”。他只是“权避水泊，专等招安”。因此，在路线上，宋江同晁盖，一开始就是尖锐对立的。但是，宋江刚上山时，立脚未稳，势力未固。在一段时间内，他还不便于同晁盖等公开唱反调，在晁盖面前很少亮他的投降路线的底。他主要利用“私放晁天王”的资本，利用晁盖对他的信任，搞抓权阴谋活动。

宋江坐上了第二把交椅，这当然不能使他满足。他以两面派手段，表面尊重晁盖，说什么“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实际上却处处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使梁山上的权力重心迅速由晁盖移向宋江。宋江的手伸得很长，到晁盖去世前夕，梁山重大活动，比如对内人事安排，对外领兵出征，全由宋江主张，晁盖的梁山泊主，已是名存实亡。

晁盖之死，给宋江全面修正梁山农民革命路线、全面推行他的投降受招安路线以可乘之机。宋江置晁盖“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的遗言于不顾，篡夺了总头领职权。大权在握之后，他立即放手大搞修正主义。他首先办的事就是“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公开宣布要众头领和他“一同替天行道”。这里的“忠义”，就是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这里的“替天行道”，就是“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亦即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为皇帝效劳。宋江道过这一行动，把忠君作为纲领公开强加给起义军，这就从根本上修正了梁山起义军的革命方向。“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标志着宋江的投降路线在梁山上占了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梁山农民起义最终要走向毁灭。这是梁山革命事业由胜利到失败的一个重大转

折点。

配合着投降主义政治路线的需要，宋江在梁山上还推行一条投降主义的组织路线。这就是招降纳叛，扩大起义军内部的投降派势力。

从表面上看，宋江上梁山后，似乎为扩充梁山起义军做了一些事情，从他上山的第四十一回到“英雄排座次”的第七十一回，梁山头领由四十名增加到一百〇八名，士兵也增加了不少。但实际上，他所要增强的主要是投降势力。宋江没有做任何工作，去发动和动员广大贫苦农民参加起义军。宋江在扩充头领方面的问题就更大。他的眼睛只钉着那些大地主、大土豪、世家贵族、朝廷名将。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没有真正的革命要求，相反地，对农民革命本来都抱敌对的态度。但是，对于宋江投降路线来说，他们却很有用，他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把他们收罗上山。

例如一个卢俊义，本是大名府“第一等长者”，有个“海阔家业”。他把梁山起义军叫作“贼人”，狂妄地说“我观他如同草芥”。他途经梁山泊，特地带了几辆空车、一袋熟麻索，扬言要“一朴刀一个”把梁山头领都砍翻捉了，装进陷车解上东京请功受赏，“方表我平生之愿”。对这样一个反动家伙，宋江不惜费尽周

折，三次兴师动众去打大名，把他“请”来。还有一个关胜，本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关菩萨”嫡派子孙。他被蔡京选中，率领官军征剿梁山。宋江对关胜的“世本忠臣”一点，仰慕之至，并且用了一番心机，把他弄上了梁山。卢俊义、关胜，以及其他一批反动分子，他们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有的是征讨梁山兵败回去不得，有的则是被宋江以各种手段再三来“请”，推脱不得——也上了梁山，但他们的上山并不意味着反动立场有了改变。这些人上山时几乎全都要与宋江讲妥一定的条件，这条件或者是“权居水泊，专等招安”，或者是“一同替天行道”，或者是“同以忠义为主”。总之是要宋江保证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使他们有朝一日可以回到朝廷方面去。

这样一批反动分子上山后，受到宋江的特别重用。从第七十一回“分调人员告示”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总兵都头领”、“机密军师”、“掌管钱粮头领”、“五虎将”、“八骠骑”等最重要职位上，他们占了多数。在上述职位的十九人中，只有吴用、林冲等少数几个革命性较强些，其余十多人，不是大地主大贵族，如卢俊义、柴进、李应等，就是原朝廷将官，如关胜、呼延灼、秦明、董平、张清、徐宁、索超等。

宋江利用篡夺来的领导权，一面招降纳叛，扩充投降派势力，一面软硬兼施，压制打击革命势力，这就使梁山上的势力对比，越来越有利于投降派而不利于革命派。且不说李逵、鲁智深、武松、阮氏三兄弟等人一直不受重用，即使是吴用、林冲这两个上山比宋江早，功劳比宋江大，在梁山起义军中一直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也受到排挤。晁盖去世时，梁山上的座次是第一位宋江，第二位吴用，第三位公孙胜，第四位是林冲，等等。事实上，宋江在领导核心中处于孤立地位。但是宋江想方设法改变了这种情况，他把卢俊义请来排在吴用前面，又把关胜招来排在林冲前面，于是投降派占了优势。

卢俊义和秦明在不同场合都曾讲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这些死心塌地忠于朝廷的“大宋人”，都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们盘据在梁山的要害部门，就成为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向“大宋皇帝”投降的基干力量。例如卢俊义坐上了梁山第二把交椅后，在历次受招安活动中充当了宋江的主要帮手。第七十五回太尉陈宗善来梁山招安，李逵等扯诏骂徽宗，大闹起来，就是宋江、卢俊义两个“大横身抱住”李逵，不许他反赵宋皇帝。这批“大宋人”，构成了一个以宋江为头子的隐藏在革命队

伍内部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叛徒集团。这是宋江推行投降路线的组织上的保证。

要实现政治上的投降主义，还必须要在军事方面有一条相应的路线来保证。宋江的投降主义军事路线，就是直接为他的投降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

梁山起义军在一个时期内打过多次胜仗，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应向政人发起主动进攻，向反动统治集团夺取政权。但是，宋江抱定了一个主意，即是“专等招安”。在“专等招安”思想的指导下，他在军事上搞的是“单纯防御”。在宋江看来，同官军打仗的目的，只是要让朝廷“不敢小觑”他，只是争取招安，他打胜仗是为了抬高自己受招安的身价。因此，他用不着作任何战略性进攻。几次大的战役，如抵敌呼延灼、抵敌关胜、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都是在官军进攻下采取的被动性措施。战斗取得了胜利，他也不去扩大占领地域，只是蜷缩于梁山一隅。梁山起义军曾先后攻克过不少州府城池，计有高唐州、华州、大名府、凌州、东平府、东昌府等，但每得一城，即便放弃，不去建立农民革命政权，而是让官军再回老窝。结果往往是这样：梁山起义军以流血牺牲为代价攻下一处城地后，除了救出几个被陷弟兄，接纳几个被俘降将外，几乎无所获益。宋江的这

种投降战略，后来连皇帝也领会到了，他说“近闻梁山泊一伙，以义为主，不侵州郡，不害良民”。

在“专等招安”的投降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宋江在战术上反对打歼灭战，主张击溃战。当梁山起义军经过艰苦奋战，打败敌军后，他往往不肯猛追穷寇，而是利用职权，把已经到手的胜利机会故意放跑。第七十七回两赢童贯时，宋江“不肯尽情追杀”，“惟恐众将不舍，要追童贯”。第八十回的济州城下一仗，城内官军已经大乱，济州唾手可得，但此时宋江却叫“收军”，不教追赶。

在“专等招安”思想的指导下，宋江经常表现得畏败如虎。在一些具体战役战斗过程中，他作为一个指挥员，常常散布失败主义情绪，扰乱军心，甚至造成战斗的失利。打东昌府时，遇到张清在阵前接连打伤梁山多员头领，宋江见了，“内心惊慌，便要将军马收转”。高俅统领十三万大军前来征剿，宋江得知消息后，更是“心中惊恐”不已。打高唐州碰到高廉“作法”，宋江在战场上居然“撇了剑，拨回马先走”，使得众头领和大小军校“你我不能相顾”，梁山部队大败亏输了一阵。

对于宋江的这条投降主义军事路线，梁山许多将士是不满的。第六十二回打大名府时，宋江因大名府